

【周恩来研究】

为人生而艺术：重估周恩来早期的文学活动

王爱军

(淮阴师范学院 文学院, 江苏 淮安 223300)

摘要:从“文学性”的角度而言,1914年至1937年不仅是周恩来文学观及其创作的萌芽期,而且也是爆发期和成熟期,其文学观可以概之为“为人生而艺术”。在“为人生而艺术”文学观的引领下,周恩来进行了多样化的文学创作尝试,诸如诗歌、小说、散文、戏剧、报告文学等多种体裁的文学创作实践活动。周恩来所创作的文学作品,内容丰厚,意蕴悠长,形式新颖,完全可以纳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总体框架中进行评述。

关键词:周恩来;文学活动;为人生而艺术;诗歌;报告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44(2012)01-0021-04 **收稿日期:**2011-07-22

基金项目:江苏省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资助项目、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资助项目(CXZZ11_0858)。

作者简介:王爱军(1977-),讲师,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影视文化研究。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瞿秋白、张闻天、恽代英、邓中夏等不仅富有杰出的政治才能,而且也具有出色的文学天赋,他们的文学思想及其创作活动已经得到人们的肯定并被载入史册^[1]。与此同期,青年时代的周恩来也有着明确的文学追求和丰富的文学活动,但一直以来未能得到文学史家的恰当叙述而处于缺席的境地。一部成功的文学史著作不应该忽略任何一位参与文学发展的建构者的功绩,因此,有必要重新探讨周恩来早期的文学活动并为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开辟一席之地。一般认为,周恩来的文艺思想经历萌芽(1914—1937年)、形成(1937—1949年)、发展(1949—1976年)三个时期^[2]。综观周恩来在这三个时期的文学活动,最富有鲜明的文学性及其创作特色的无疑是第一个时期,即1914至1937年。美国进步作家斯诺曾说周恩来“从很小的时候起就表现出有突出的文学天赋。但是,像他同辈的许多其他人一样,他在民族觉醒的时期里受的教育,使他的兴趣从文学转移到别的方面去了”^[3]。这便说明从“文学性”角度而言,1914年至1937年不仅是周恩来文学观及其创作的萌芽期,而且也是爆发期和成熟期。此后,因为“民族觉醒”的合力,周恩来的兴趣“从文学转移到别的方面去了”。本文从“文学性”的视点来考

量周恩来文学观的形成、文学创作实践活动以及其早期文学活动的文学史价值。

一、为人生而艺术：周恩来的文学观

“烟霾布正浓”——周恩来文学观的形成背景。

周恩来诞生的时代正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惨时代。周恩来6岁时,便开始在外祖父家念私塾。嗣母陈氏是周恩来的文学启蒙老师,《窦娥冤》、《西厢记》、《西游记》等文学故事以及太平军、义和团等草莽英雄反抗压迫的事迹,都给童年的周恩来留下了深刻印象。1910年夏,12岁的周恩来离开家乡,跟伯父去了东北。1911年进入沈阳(当时的奉天)东关模范两等学堂上小学。这一时期,周恩来各门功课的学习成绩均为优等。课余时间喜欢阅读《史记》、《汉书》、《离骚》等中国古代文学名著,增强了文学素养。1913年,周恩来考入了天津南开学校。求学期间,周恩来耳闻目睹了社会黑暗、民族危亡的现实,激发了他深厚的爱国情感以及“为中华之崛起”而认真学习的顽强精神。周恩来利用课外时间阅读了许多宣传革命真理的书籍,如顾炎武、王夫之等的著作,以及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法意》,严复翻译的《天演论》,进步刊物《民权报》、《民立

报》、《大公报》等。与此同时,周恩来积极组织 and 从事进步的文艺社团活动。1914年3月,他和两位同学发起组织了文艺社团——敬业乐群会,该会下设新剧团、演讲团、军事研究团、国文研究团等,创办了《敬业》刊物。《敬业》是一种学报性质的半年刊,是周恩来文学萌芽期的实践阵地,刊有周恩来用飞飞、翔宇、恩来署名写的诗词文章。周恩来的文学处女作《春日偶成》就发表在1914年《敬业》学报创刊号上。诗作表达了对袁世凯黑暗统治的猛烈抨击以及对真理光明的追寻向往。1920年11月至1924年9月旅欧期间,周恩来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同实地考察、直接参加革命斗争结合起来,从而在思想上实现了新的飞跃,在文学上也有了新的发展,创作了报告文学《旅欧通信》。1924年9月,周恩来离开欧洲,回到国内,先后参与领导了黄埔军官学校、统一广州、北伐战争、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反对“四一二”事变等重要的政治军事活动。革命活动虽然紧张忙碌,但他从未放弃文学之笔,文学成为他战斗的利器。如组织成立“血花剧社”并亲身实践,倡导江西兴国民歌,撰写讨伐国民党的社论^[4],等等。正是在这种腐败政治、黑暗统治、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激发下,周恩来的文学性厚积薄发,以“文学”之体抒发诗意情怀和信仰追求,创作了一批具有鲜明特色的文学作品,体裁涉及诗歌、小说、话剧、散文、报告文学、杂文等各个方面。

“以切合人生为范围”——周恩来文学观的本质内涵。

周恩来在1919年7月12日发表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发刊断趣》中提出“现在世界最新的思潮是讲‘实验主义’。我们学生尤应当将我们所学的去求实验。这也是王阳明所说的知行合一的主旨。”“新闻的记载以有关于社会生活、人类进步为范围,并且力求敏捷。”“对于社会生活同各种学术,用哲学的眼光科学解析,公允正确的批评。”“介绍国民必须的常识于社会。”“介绍现在最新思潮于社会。”“文艺的登载以切合人生为范围。”^{[5]419-420}这种“知行合一的主旨”、“最新思潮于社会”以及“以切合人生为范围”的新文艺主张,实质上就是一种“为人生而艺术”的文学主张和追求。这比起1920年1月茅盾在《现代文学家的责任是什么?》中初次阐述的“为人生”的文学观以及1921年1月4日文学研究会成立时所阐述的

较为系统的“为人生而艺术”的主张,在时间上都要早许多。这足以见出周恩来对文学与生活关系认识的敏锐性和深刻性。

作为周恩来文学观的本质内涵,“为人生而艺术”在周恩来文学实践中表现在:一是关于“古今”文学关系的处理。1915年前后,周恩来以实际行动参与并支持文学革命,热心提倡白话文,积极开展新剧运动,对《新青年》同仁“所持排孔、独身、文学革命诸主义极端的赞成”^{[6]25}。与此同时,他也关注旧文学,研究与借鉴旧体诗,吸收旧体诗形式上的优点,革新旧体诗内容上的陈腐。周恩来在南开读书时曾在《敬业》学报上刊文,讲自己童年在家乡淮阴岳飞祠中看到的题诗“一自金牌颁十二,常教血泪洒英雄。奇冤长恨埋三字(即‘莫须有’,引者注)和虜终惭失两宫。南渡江山悲逝水,北征鞍马付秋风。低徊往事成千古,祠宇空余夕照红。”观诗有感,认为“其辞则凄凉欲泪,意则新颖出群,不落窠臼;少陵、太白殆兼而有之”^{[5]140}。中肯的诗评显示周恩来不凡的文学功底以及对古代诗文的独特体悟,也昭示了周恩来在对待旧文学方面持以批判继承的原则。这在激烈反传统的五四时代,不能说不是一种远见卓识。二是对于“中外”文化关系的处理。周恩来一直主张中西文化、中外文学的相互借鉴、促进与融合。周恩来曾说“泰东西的文化比较我们的文化可以说新的太多。他们要是主宰中国,决不能像元、清两朝被中国的民性软化了。我们来到外洋求真学问,就应该造成一种泰东西的民族样子去主宰我们自己民族,岂不叫比着外人强万倍不止了么?”^{[6]32}为此,周恩来亲身践行,积极地向中国文坛输送异域文化和文学养料。他在《吾校新剧观》中便介绍了西方戏剧的流派、品种、发展潮流等。在报告文学《旅欧通信》中不仅仅介绍了西方的政治经济状况,而且介绍了大量的西方文化以及文学样式。这足以说明,周恩来在实质上暗合着五四的文学革命精神,即以西方文学为参照来建构中国的新文学。

二、文为心声——周恩来文学观的具体实践

在“为人生而艺术”之文学观的指引下,周恩来进行了多样化的文学创作尝试,如诗歌、小说、散文、戏剧、报告文学等,尤以诗歌、报告文

学、戏剧活动最为卓著。例如,周恩来在南开剧社先后饰演了十部剧中的角色,且多为主角,他甚至集编、导、演于一身,不仅是一个“多面手”,而且显示了深厚的文学艺术功底^[7]。综观周恩来所创作的文学作品,其题材多样,形式新颖,意蕴悠长,完全可以纳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总体框架中进行叙述。下面仅以诗歌、话剧、报告文学为例来解读。

首先,生命的情绪——周恩来的诗歌创作。

在五四文学革命期间,当新诗尚处于萌芽状态时,周恩来便身先士卒,以别致之作为新诗坛吹进了一股清新之气。周恩来现存诗歌19首,几乎都作于1914至1937年这个时期,质量上乘。他的“大江歌罢掉头东”等八首新诗所寄寓的“人生主题”自成风格,即使现代诗坛在当时并没有接受它,但在“史”的坐标上,这些诗歌无疑存在着较高的认识价值及美学意义。

《雨中岚山——日本京都》作于1919年4月,刊于1920年1月《觉悟》杂志创刊号。作者有感于当时国际、国内形势以及自身求学日本的经验,发出“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的人生感慨,体现了追求的曲折性。道路虽为曲折,但因为有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和坚定信仰,因此前途也隐现着光明,诗人充满着憧憬,于是,产生了“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娇妍”这句颇有象征意味的诗句。整首诗歌,寓情于景,借景抒情,语言清新,诗味充盈,完全可以纳入20年代的浪漫主义诗歌中进行评析。

《死人的享福》作于1919年12月,刊于1920年1月《觉悟》杂志创刊号。这首诗歌与鲁迅短篇小说《一件小事》有异曲同工之妙。但从创作时间来看,《死人的享福》比《一件小事》早半年出现。从创作质量上来看,该诗题材新颖——车夫,情感质朴——人道,语言清新——白话,比胡适的新诗《蝴蝶》、康白情的《草儿》、臧克家的《老马》都毫不逊色。可以说,周恩来的这类新诗无不释放着极具个性色彩的生命情绪,立人的意识显露无遗,它们理所当然地汇入了现代文学的现实主义创作潮流之中。赵朴初曾说“周对于诗道不仅有极高的天赋,而且还下过极大的苦功;五四前写的传统旧体诗,风骨开张,才气横溢,五四后转向新体诗,也是卓有成就,不同凡响。”^[8]是为中肯之评。

其次,人生的启蒙——周恩来的话剧活动。

进入南开校园的周恩来,逐渐成为活跃的话剧活动分子,戏如人生,以戏启蒙,这是青年周恩来的文学理想。他在《校风》期刊上发表的《吾校新剧观》是文学革命的最早一批成果之一。他认为“通俗教育最要之主旨,又在舍极高之理论,施以有效之事实;若是者,其惟新剧乎!”^{[5]204}离开“新剧运动”则社会教育终无普及之望,而国家精神亦永无表现之一日矣。”^{[5]205}可见,周恩来是抱着以“新剧”教育民众、改良人生的目的。于是,在戏剧题材选择上,往往涉及封建伦理、社会黑暗、科学民主等宏大叙事,如《一元钱》、《一念差》、《仇大娘》、《新村正》和《新少年》等话剧,结构巧妙,立意明显,皆有启发蒙昧、追寻光明之旨意。当胡适的《终身大事》作为第一部现代话剧受到国人注目的时候,我们实在无法忽视周恩来在南开校园所作的“学生式”努力。这些新剧,大都反映了深刻的现实人生问题,反帝反封建倾向鲜明,具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与现代文学的现实主义文学潮流交相辉映。

最后,形象的诉求——周恩来的报告文学创作。

我国的报告文学发端于五四,兴盛于上世纪30年代,这是学界所公认的。研究者也视周恩来的《旅欧通信》(1921年2月至1922年3月,约30万字)为我国报告文学早期的力作。不过学界认为周恩来对我国报告文学发展的贡献却非始于《旅欧通信》,而是他赴欧留学之前在狱中所写的《警厅拘留记》以及出狱后所写的《检厅日录》。因此,可以把《警厅拘留记》和《检厅日录》视为周恩来早期报告文学的雏形,《旅欧通信》则是其报告文学创作的发展。

周恩来的报告文学除了具有“社会化色彩”这一报告文学的共性之外,还具有其独特的个性,即以细节凸显形象意蕴的文学性色彩,表现为对人事绘声绘色的描摹,以凸显作品的“形象性”。如《警厅拘留记》中描写警察殴打学生一节,警察武断、蛮横、残暴的情景,以及学生据理力争的情景,形象逼真。类似的描写在《警厅拘留记》、《检厅日录》、《旅欧通信》中还有很多。当时的周恩来虽然是以文学作为战斗的利器,但也并未使文学陷入“工具论”的泥沼,而是努力刻画逼真形象,以形象寄寓情感指向,同样达到了以文学批判社会的目的。这也进一步说明周恩来具有极高的文学修养和文学

追求 而他的文学实践——报告文学创作自然也汇入了20年代的新散文创作潮流之中。因此,周恩来的《警厅拘留记》、《检厅日录》、《旅欧通信》等报告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无疑具有开创性的作用,其地位完全可以与瞿秋白的《饿乡纪程》、《赤都心史》等报告文学作品媲美,称得上是中国报告文学开创阶段的佳作。

三、“文”当入“史”

——周恩来文学活动的文学史意义

综上所述,周恩来的文学观及其创作,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精彩片段,它具有较大的理论价值和文学史意义。但是,从学术研究角度来看,由于社会历史等主客观原因,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做得还不够扎实和充分。

新时期以来,随着我国文艺界、文学研究界的解冻,周恩来的文学观及其创作才逐渐被人们所重视,出现了一批研究成果。研究论文有陈言力的《周恩来与文艺》(《杭州师院学报》1986年1期)、罗大成的《周恩来文艺思想初探》(《成都大学学报》1987年2期)、王耀辉的《现代报告文学的开拓者周恩来和瞿秋白》(《华侨大学学报》1987年2期)、梁丹的《周恩来早期报告文学的实践及其贡献》(《广西师院学报》1990年4期)、王凤胜的《论周恩来文艺思想的总体特征》(《南都学坛》1995年4期)、郭澄的《周恩来与现代文学发展述略》(《新疆教育学院学报》1998年2期)、陈扬勇的《周恩来对新中国文艺事业的理论贡献》(《文艺理论与批评》1998年2期)、周丁力的《周恩来青少年时期的旧体诗创作》(《重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年4期),等等;研究著作有刘滋培的《周恩来诗讲析》(宁夏人民出版社1981年)、徐子芳的《周恩来诗传》(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葛新的《周恩来诗歌注析》(作家出版社1998年)、余飘的《周恩来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贡献》(华夏出版社,1988年)、王凤胜的《周恩来文艺思想新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曾训骐的《周恩来诗歌赏析》(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7年)。

很显然,关于周恩来的文艺思想及其文学创作方面的研究工作也由表及里、由单一到系

统地逐渐展开,这是令人欣喜的学界盛事。然而,以上的研究成果多从“文艺”层面大范围地解读周恩来的文艺创作及其思想,如研究者认为“周恩来的文艺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发展历史上和理论宝库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1],这的确是中肯的评价,然而,绝大多数研究者都没有以“文学性”视点来整体考量周恩来的文学观及其实践,尤其没有把周恩来的文学创作纳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框架中进行叙述,周恩来早期的文学活动未能得到文学史家的恰当叙述而处于缺席的境地,这着实是不应该的。

无论从哪个角度分析,周恩来的文学观及其创作实践都应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中留下踪迹,比如他的新诗《雨中岚山——日本东京》和报告文学作品《旅欧通信》等。但是很遗憾,目前所能见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没有一本叙述到周恩来的文学观及其创作实践。周恩来参与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建构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内容主题和精神旨意,因此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框架中应该有周恩来的声音。

参考文献:

- [1] 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125-142.
- [2] 王凤胜.周恩来文艺思想新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1.
- [3] 斯诺.西行漫记[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44.
- [4] 周恩来.反对国民党残酷的白色恐怖[N].群众日报,1931-02-07.
- [5] 周恩来早期文集: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
- [6] 金冲及.周恩来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 [7] 夏家善,崔国良,李丽.南开话剧运动史料[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161-171.
- [8] 张蓉.说不尽的赵朴初[J].中华儿女,1991(1).

责任编辑:张超